



葛兰西 语言与霸权

LANGUAGE AND
HEGEMONY IN
GRAMSCI

[加] 彼得·艾夫斯 / 著

(Peter Ives)

李永虎 王宗军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葛兰西 语言与霸权

LANGUAGE AND
HEGEMONY IN
GRAMSCI

[加] 彼得·艾夫斯 / 著

(Peter Ives)

李永虎 王宗军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葛兰西：语言与霸权 / (加)彼得·艾夫斯
(Peter Ives) 著；李永虎，王宗军译. --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6

书名原文：Language and hegemony in Gramsci
ISBN 978-7-5201-2746-2

I. ①葛… II. ①彼… ②李… ③王… III. ①马克思
主义哲学-语言哲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8438 号

葛兰西：语言与霸权

著 者 / [加]彼得·艾夫斯 (Peter Ives)

译 者 / 李永虎 王宗军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曹义恒

责任编辑 / 曹义恒 孙军红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15.25 字数：238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2746-2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17-4968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受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Language and Hegemony in Gramsci.

Copyright © Peter Ives, 2004.

First published by Pluto Press, London. www.plutobooks.com

本书根据冥王星图书有限公司 2004 年版译出

译 序

一 理论背景及简介

英国左派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其2012年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如何改变世界》中这样评价葛兰西的历史地位：“葛兰西已经成为我们思想世界的一部分。他作为原创性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地位——在我看来是1917年以来西方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已经得到相当普遍的承认。”^①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除了继续发掘葛兰西政治哲学、文化批判理论与现代、后现代思潮的关联外，他的语言观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与之相关的背景，在西方哲学“语言转向”之后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同当代语言学关系的根本问题：是否有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雷蒙德·威廉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关于语言本身的理论上贡献甚微。”^②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发展阶段，其奠基者卢卡奇也只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脚注中暗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进行语言学研究可能得到很有趣的成果。”^③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提“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这个概念的话，又是在什么意义上提的呢？

因此，开展对葛兰西语言学思想的研究就显得别具理论意义：与同时

①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吕增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第296页。

② [英] 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19页。

③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155页。

期其他无产阶级理论家相比，葛兰西不仅有自始至终研究语言学的高度理论自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他还开了用语言学方法研究社会政治理论的先河，由此在无形之中将 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语言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双重兴起汇聚于一身，并最终向世人表明：在对人类语言问题的解释上，存在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研究方法，因此存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理论。而葛兰西自身的语言学思想则构成续写这一理论传统的关键一环。

本译著选取的加拿大学者彼得·艾夫斯（Peter Ives）于英国伦敦冥王星出版社（Pluto Press）出版的《葛兰西：语言与霸权》（2004 年）一书，就是一部具有高度原创性的研究葛兰西语言思想的专著。

彼得·艾夫斯，出生、成长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1991 年获波特兰里德学院学士学位，后在加拿大约克大学获硕士（1993 年）和博士（1998 年）学位。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和曼尼托巴大学，现为温尼伯大学政治学专业副教授。艾夫斯的主要研究兴趣包括政治与民主理论中的语言作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和女权主义，并在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反思马克思主义》《社会和政治哲学评论》《政治研究》《教育哲学和理论》等期刊以及詹姆斯·马丁编辑的《安东尼奥·葛兰西：批判性评价》等葛兰西研究论集上发表了诸多研究论文。其研究成果还被翻译成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和德语，并在国际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除《葛兰西：语言与霸权》之外，艾夫斯在葛兰西语言思想研究上还出版过本译著的姊妹篇《葛兰西的语言政治学》（多伦多大学出版社，2004 年，该书曾获加拿大 2004~2005 年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类雷蒙德·克莱班斯基奖），以及 2010 年与他人共同编写的《葛兰西，语言与翻译》（莱克星顿出版社，2010 年）。综合来看，以《葛兰西：语言与霸权》一书为代表，艾夫斯注意到了葛兰西研究中长期以来为学界所忽视的一个重要维度，即语言学的维度。因此，本书的主旨就是从“语言转向”的视角来讨论葛兰西霸权思想的由来及其语言学表现，而其落脚点则在于揭示葛兰西在“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与“全球化”语境下的时代意义。

具体而言，本书主体加“前言”部分共六章。

第一章概述了语言在当代社会理论中的发展，涵盖对索绪尔所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维特根斯坦所代表的语言分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介绍。

第二章追溯了葛兰西语言学发轫的时代、个人求学背景。意大利在1861年政治统一之后，没有成为一个有着文化或社会凝聚力的国家。其主要障碍之一就是“语言问题”——新意大利公民几乎没有一致的意大利标准语。葛兰西发现，法西斯主义正是利用了“语言问题”所造成的意大利区域和阶级隔阂而成功上台的。此外，本章还考证了意大利语言学家阿斯科利、巴托利的语言观对葛兰西后来思想发展的影响，特别是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提出，其源头与其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语言学训练背景密切相关。

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艾夫斯重点阐释了葛兰西的核心概念，如霸权、有机知识分子、消极革命、阵地战的语言学向度。例如，在第三章中，艾夫斯通过探究葛兰西对自发语法和规范语法的划分，说明统治阶级正是利用规范语法的霸权不断吸收自发语法的词汇、规则，并抑制自发语法的发展，最终从语言文化层面实现了国民意志的统一。在此基础上，艾夫斯对葛兰西的“常识”概念及其理论做出了非常具有新颖性的梳理、归纳，并提出葛兰西对民众常识的意识形态批判是以语言分析为理论基底的。第四章在第三章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析了葛兰西的语言学思想与其消极革命、游击战、阵地战、市民社会、国家、民族集体意志和历史集团等概念的内在关联。其核心问题是：葛兰西是怎样通过语言来思考强制与认同之间关系的。艾夫斯在第四章中特别指出，语言既是已经存在的语言结构，也是世界观与霸权的显现方式。而葛兰西对语言与权力关系的讨论为我们深入理解权力的日常生活化的运作策略提供了一种极富洞察力的理解。

第五章将葛兰西思想中语言与霸权的讨论与当代社会理论、文化批评理论相结合。本章通过强调在后现代主义、新社会运动和全球化的争论中，语言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揭示了葛兰西的影响力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减弱。在本章中，艾夫斯逐一讨论了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德里达、拉克劳、墨菲等人与葛兰西在后现代立场上的同异。艾夫斯的新颖之处还在于，他通过将葛兰西与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墨菲的比较研究，证明他们正是

借助于葛兰西才成功实现了从正统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向。以这种方式，葛兰西的语言政治学成为拉克劳、墨菲激进民主、“多元决定”理论的前提。通过使用语言和话语的后结构理论比较，艾夫斯提出，葛兰西提供了一种克服现代性危机、重新思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二元对立的可行弥合路径。此外，本章还讨论了符号学、解构理论中的主题，揭示了在语言日益商品化的后现代社会中，葛兰西的思想有可能成为解决后殖民主义、新全球霸权意识形态侵略的重要思想资源。

总体来看，彼得·艾夫斯的这本书视角新颖，著述翔实，说理透彻。在同时涉及的“语言学”和“葛兰西”这两个专题上，该书将西方现代、后现代各流派的语言学理论，与近年来英美学界翻译、研究葛兰西思想的最新研究成果有机地融合起来，帮助我们从语言学这样一个新异角度重新读懂葛兰西的霸权思想。为帮助读者较快地摄取本书思想精华、了解葛兰西语言观与其霸权思想的关系，译者结合自身对本译著的学习体会及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成果，围绕“葛兰西语言学思想的缘起”“葛兰西的历史唯物主义语言观”“葛兰西思想中的语言与霸权”这样几个问题在下文中谈谈自己的理解，以供读者参考。^①

二 葛兰西语言学思想的缘起

在葛兰西的理论著述中，语言问题始终占据着显著的位置。论及他对语言学研究的志趣，艾夫斯曾在他另一本研究葛兰西思想的专著中做出了这样的总结：“贯穿葛兰西的一生——一个撒丁岛人、一个都灵大学语言学的学生、一个政治家、一个狱中作家、一个理论家——以及在他所发展并被其称为‘活的语言学’的实践哲学之中，都涉及语言。”^②那么，主要身份是意大利政治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非语言学家的葛兰西为何会如此

^① 参见李永虎《语言、历史与霸权：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建构》，《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8~13页。

^② Peter Ives, *Gramsci's Politics of Language: Engaging the Bakhtin Circle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4, p. 4.

重视语言问题呢？除了葛兰西独特而可贵的品质——从不回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而尝试通过对语言和霸权关系的思考，以努力探索打开马克思主义当代视域的可能方式之外，他在1929年2月8日列于“笔记本1”中两个有关语言研究的题目——“新语法学派和新语言学派（‘这个圆桌是方的’）”和“意大利的语言问题（曼佐尼和阿斯科里）”，为我们寻找其自身语言学思想的缘起提供了原初的线索。具体而言，前者指向葛兰西求学时期所接受的语言学学术训练背景，而后者则与当时意大利知识分子普遍关注的语言统一问题相关。

首先，就葛兰西的早期求学经历来看，他在1911年冬进入都灵大学文学系现代语言学专业学习时，遇到了意大利当时著名的新语言学派代表人物巴托利（M. Bartoli）教授。巴托利不仅启发了人们对葛兰西语言学的研究兴趣，而且对他历史唯物主义语言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巴托利在驳斥新语法学派“语言孤立、自发发展”的机械实证主义观点的过程中，受早期语言学家阿斯科里（G. Ascoli）和吉列隆（J. Gillieron）“语言地理学”研究成果的启发，对语词相互竞争的现象进行了分析：两个分属不同文化的语言单位，如两个近义词或短语，当它们汇集到一个语言系统中时，因相互竞争关系会导致一个词语被保留而另一个词语将不再被人们使用。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其中一个语言单位能胜过另一个语言单位呢？在巴托利给出的五种影响因素中，他着重强调了文化对语言的影响——两种语言发生接触后总会产生冲突，正如它们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两种文化会发生冲突一样。到底哪一种语言单位能够胜出，最终取决于它所负载的文化影响力的作用。巴托利的此种“文化冲突论”对葛兰西的影响是显见的。例如，“语言习得就是学习特定人群的文化表达方式”，“语言不存在单性繁殖，语言生产着其他语言。创新产生于不同文化的碰撞”，这些不时出现在葛兰西早年著述中的词句，说明他在青年时期已形成“语言是文化和社会历史概念”的判定。

不过，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葛兰西一直都是新语言学派的忠实拥趸，相反，就像马克思扬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一样，新语言学派之于葛兰西只是他建立历史唯物主义语言观的导引。在汲取了新语言学派合理的历史

主义方法和分析语言变化的社会学视角之后，这位被巴托利盛赞为“被派来一举剿灭新语法学家的天使”，还是离开了语言学家之间的这种学术攻讦——以革命事业为己任的葛兰西从来无意成为一名学院派的语言学家，而在对意大利民族语言的研究中，他也从未将语言问题看成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相反，从研究语言学时起，他就将语言学范式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正如意大利学者皮帕诺^①所言：“‘语言’、‘世界语’和‘词汇’等术语的隐喻使用，以解释严格意义上语言领域之外的现象，这是葛兰西智识游历的一种显示。语言本身及其共识功能，既被间接地认为是社会生活基本组成部分，同时也被当作这个广大而复杂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②

其次，葛兰西语言学思想的发轫还离不开意大利一直存在的“语言问题”。出于历史原因，意大利境内语言状况可谓复杂多样。虽然早在14世纪随着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作品的传播，以托斯卡纳方言为主要书写形式的文学标准语已基本形成，但迟至19世纪中期意大利半岛统一，一个真正通行全国的民族语言对许多意大利人来说仍是不存在的——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在使用本地区的特定方言，以至于普通人的交际都成了问题。日益严峻的“南方问题”所导致的南北经济发展不均衡，本已使意大利的现代性畸形发育，而统一民族语言的匮乏则加剧了意大利发展的痛苦——民众迁徙、义务教育、城市化等无一不深受阻滞。作为一个20岁时从南方落后的撒丁岛来到北部工业重镇都灵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对这种南北方之间、各社会阶级之间由于缺乏沟通而显得毫无凝聚力的现实，无疑是有着切身感受的。他在将其定义为一种“严重的社会分裂”状态的同时，对语言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当同时代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布哈林）将阶级对立归结于经济的因素，语言被归之于并不对现实起决定作用的文化、观念上层建筑时，葛兰西则从意大利“语言问题”所加深的分裂现实中看到：阶级差异不仅

① 皮帕诺（Franco Lo Piparo, 1946年~），意大利语言学家，巴勒莫大学语言哲学教授，他对发掘葛兰西语言学思想有突出的贡献。

② Franco Lo Piparo, *Language, Intellectuals and Hegemony in Gramsci*, Bari: Laterza, 1979, p. 135.

仅源于利益的分化，还有文化的、观念的特别是以不同语言为代表的异质世界观所引发的冲突。“某个只讲方言或者对于标准语言不甚知晓的人，则与之相联系的，比起在世界历史中占统治地位的主要思潮来说，是或多或少狭隘的、地方性的、落后的和不合时宜的。”^①至此，语言批判不仅成为葛兰西理解意大利社会转型矛盾的一个入口，也成为他全部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早在1916年初，葛兰西就在社会党周刊《人民呼声》上发表文章，强调了文化活动和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没有文化，无产阶级永远不能认清自己的历史作用。启蒙运动作为法国大革命的前奏，已很好地说明了革命必须以文化批判为先导。具体到语言来说，统治阶级只是在为自身利益辩护时，才会给予他们的压迫政策以“人民”的语言外壳。因此，祛除资产阶级及其附庸语言学家笼罩在语言上的“迷雾”，必然要求知识分子对语言采取严肃而科学的态度。

三 葛兰西的历史唯物主义语言观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将语言现象分为共时和历时两种，他虽不否认历时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但他认为“语言状态无异就是历史现实性在某一个时期的投影”，语言学研究的就是这个已成静止的“投影”的逻辑关系，即语言的共时结构。与索绪尔相仿，现代语言学家大多假设了一种静止的、无历史结构的语言。例如，乔姆斯基认为，结构是由理性人的思想构成的，而哈贝马斯主张理性意味着语言能力和一套交往准则。换言之，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中，语言结构不仅是可决定的而且已被决定。葛兰西则拒斥这种结构观念，他认为整个语言结构是向未来开放的，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语言结构。因此，强调语词意义的历史生成性与流变性，成为他历史唯物主义语言观的核心。他也由此反对任何先验的、在先可被把握的“语言本质说”：“‘语言’实质上是一个集合名词，它根本不会预先假

^①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s and Trans by Q. Hoare & G.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p. 325.

定存在于时空之中的某种‘唯一的’东西。”^①也就是说，葛兰西对语言基本性质的理解，正如他对巴托利所评价的那样，后者的语言观尽管是唯心主义的，但“他改变了语言学，将语言学从一种狭隘的自然科学转变为了历史科学，它的根源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中’中寻找”。

葛兰西认为，如果对语言现象缺乏批判的历史性概念，就有可能在科学和实践的领域造成许多谬误。比如，他重点批驳了以下三种语言学的谬误。

其一，美学性的谬误。这种谬误以克罗齐“语言学与美学统一说”为代表。克罗齐在《美学原理》中提出：“声音如果不表现什么，那就不是语言。语言是声音为着表现才连贯、限定和组织起来的。”克罗齐认为，语言作为人精神活动的创造物，其美学特征远远超过它的交流功能——语言和艺术一样都是纯粹的表现，都是有关心灵的科学。因此，克罗齐说：“世间并没有一门特别的语言学。人们所孜孜以求的的语言的科学，普通语言学，就它的内容可化为哲学而言，其实就是美学。任何人研究普通语言学，或哲学的语言学，也就是研究美学的问题；研究美学的问题，也就是研究普通语言学。语言的哲学就是艺术的哲学。”^②而在葛兰西看来，尽管克罗齐高度肯定了人在语言发展史上的创造作用，并从人和动物声音之别的角度，揭示了人类语言的丰富性和审美维度，但克罗齐所说的创造主要是历史上伟大人物对语言的影响，如穆罕默德、但丁和路德等人，分别对阿拉伯语、意大利语和德语的形成所起的奠基作用，至于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体——人民群众——则是在其视野之外的，从而完全抹杀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功绩。“语言史是语言创新的历史，但是这些创新不是个体行为（如同艺术的情况）。它们是全社会共同体更新自身文化并历史性地‘发展’的结果。诚然，这些创新成果会化为个体的，但不是艺术家意义的个体，而是作为完

①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Cultural Writings*, Trans by W. Boelhower.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5, p. 174.

② [意] 克罗齐：《美学原理》，朱光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191页。

成了的、确定的历史文化要素的个体。”^①

其二，建立普遍理想语言的乌托邦。鉴于困扰意大利民族统一的“语言问题”，著名作家曼佐尼作为官方代表在19世纪60年代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以行政强制、公共教育等方式将托斯卡纳地区的佛罗伦萨方言升格为“国语”，以此来结束意大利方言众多且使用混乱的局面。不过，曼佐尼的此种单一语言规划方案受到了包括阿斯科里、克罗齐在内的意大利知识界的广泛批评。意大利社会党为抵制这一方案，甚至转而主张以柴门霍夫发明的人工语言——世界语——作为意大利的标准语。葛兰西则在1918年以一名“正在尝试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应用到语言史研究中”的大学生的身份，发表了一篇名为《单一语言和世界语》的文章，对这两种语言统一方案同时进行了批驳。在他看来，这两种语言解决方案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都试图脱离语言的历史生成性而意图建立一个普世语言的乌托邦。“现在创建单一语言的这些尝试没有超出乌托邦的界域。它们都是法伦斯泰尔和幸福乐园般心态下的产物。”^②正如马克思所言：“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③葛兰西也认为，某种语言的传播是由操此语言的人通过写作、贸易和商业等生产活动促成的。因此，他赞成阿斯科里的观点，一种民族语言或国际语言的形成应建立在既存的政治—文化的现实基础之上，而人造语言方案因其无根性只会招致失败。但是，葛兰西超出阿斯科里之处在于，他将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方法贯彻到底，指出语言本身从来不是“与内容无涉的文字语法，而是已有观念和概念之总体”^④，人工理想语言的本质是“在百科全书派极力鼓吹下妄图形成资产阶级思想一统天下的产物”^⑤，而其带来的不过是

①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Cultural Writings*, Trans by W. Boelhower.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5, pp. 177–178.

②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Cultural Writings*, Trans by W. Boelhower.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5, p. 30.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3页。

④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s and Trans by Q. Hoare & G.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p. 323.

⑤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Cultural Writings*, Trans by W. Boelhower,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5, p. 27.

“资产阶级的生活观念——或为生意，或为休闲而四处奔走，而不是稳定创造财富的市民”^①，从而刺破了语言深层的意识形态维度。

其三，生造新词的武断倾向。这种倾向根源于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Pareto）和实用主义者普雷佐里尼（Prezzolini）等人提出的“语言是谬误的渊藪”的命题。他们认为，哲学的混乱是由于语言的误用而引起的，据此他们或致力于创造一种有着数学一般清晰、严密的“词典”，或编出一套抽象的语言形式理论。而在葛兰西看来，这种割裂语言史，意图把语言的比喻义和引申义剔除出去的做法只会把语言变成一堆毫无生机的、僵死材料。因为按照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语言“是一个连读不断的隐喻过程”。语言隐喻的现象是指一个新概念替换了先前的概念，但先前的词语还继续在使用，只不过是在衍生的意义上使用。或者用结构主义的术语来说，词语符号的能指没有变化，而其所指已改变。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以“disaster”一词举例说明了语言发展的这种历史继承性。在词源学上，disaster原是占星术术语，指星宿出现星位异常的现象，意指“天灾”，而现在人们则用它指涉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新旧对比，人们发现，disaster虽已失去了它的原指——没有人会认为它是一个占星术的概念，但它的现在义“自然灾害”显然包含着它原本所指“灾难”这个基本义。也就是说，disaster的现在义是在它古义基础上通过隐喻的方式扩展而来的。不仅这个词是这样，葛兰西认为，整个语言本身“总是隐喻的。如果或许不能说所有的话语在所涉及事物的物质的和感性的（或抽象概念）方面都是隐喻的，以便不去过分地扩大隐喻的概念的话，那么却可以说，现在的语言，在所用的语词具有先前的文明时期的意义和意识形态内容方面，是隐喻的”^②。因此，在他看来，生造新词的做法正如寻求一种普遍理想语言一样荒谬。

①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Cultural Writings*, Trans by W. Boelhower,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5, p. 27.

②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s and Trans by Q. Hoare & G.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p. 450.

四 葛兰西思想中的语言与霸权

目前，国内学界对葛兰西最具代表性的霸权理论探讨繁多，但论者往往忽视了解读其霸权思想的语言之维。以艾夫斯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研究葛兰西的语言学思想将成为开启他霸权理论的一把密钥：“铸就葛兰西霸权哲学原初的铸模不应在马克思、列宁或其他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寻找，而应在语言科学中找寻。”具体而言，葛兰西对语言的研究涉及民族语言的统一、对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语言观的双重批判、有机知识分子的作用等多个方面，而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就是如何形成底层阶级的新文化并重新组织霸权的问题：“语言问题每一次浮出水面，无论怎样，都意味着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涌现：统治阶级的形成与扩大，要求在统治集团和民众之间建立更紧密、更稳固的关系，换言之，就是去重组文化霸权。”^①

在葛兰西的政治哲学中，霸权主要是指一个阶级团结和凝聚广大群众的能力。在此概念发展上，他最为突出的贡献是考察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强制与共识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其核心问题是：资产阶级是怎样以一种难以察觉的权力使用方式去影响和组织共识的？换言之，资产阶级霸权不仅表现为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统治，还表现为资产阶级在日常生活和话语实践等领域，以获取下层集团同意的方式来实现其统治。具体来说，透过市民社会领域，资产阶级将自身的哲学、道德等渗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和实践，并最终使他们“保存了统治集团的心态、意识形态和目标”，上层集团的统治与压迫由此被转化为对普通人的常识进行塑造的话语实践和策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葛兰西正是以语言为突破口来分析整个社会的思想体系是如何被收拢并保持统一的。艾夫斯认为，尽管葛兰西并未明确说明语言和霸权的关系，但从其研究笔记，特别是“笔记本 29”中关于语言问题的解析，可以推论语言在葛兰西那里是对霸权的一种隐喻。

^①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Cultural Writings*, Trans by W. Boelhower.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5, pp. 183 - 184.

首先，语言是促成共识形成的文化工具。当索绪尔提出语言学的任务是“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时，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者是不关心语言现象背后所折射的诸如社会权力结构等政治问题的，而在葛兰西看来，语言问题应该用“历史语言科学”来看待——语言不能与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相分离。正如克罗齐以合乎语法但不合逻辑的命题“这张圆桌是方的”来否定语法存在的意义时，他不知道该命题在被放置到一个宽泛的社会语境中时具有指涉疯人癫语的表现意义。同理，葛兰西认为，不同语言系统，如方言和民族文学语言之间的关系是随着文化、政治、伦理的变化而变化的。并且，不同的文化、政治和经济条件构成了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霸权，而其霸权地位又与一个社会阶级和智识阶层的霸权是密切关联的。换言之，社会关系变化是促成语言系统与语言规范变革的动因，反过来语言规范经常成为收拢并统一不同阶层语言用法、形成共识的文化工具。“语言是通过新阶级带来的文化，并以一种民族语言对其他语言行使霸权的方式等，随着整个文明的变化而变化。”^①

其次，自发语法与规范语法的辩证关系构成了霸权的动力学基础。葛兰西在《能有多少种形式的语法》一文中区分了两种语法类型：自发语法和规范语法。自发语法是“人们依据语法言说而不自知”的语法，并且它的“数量不可胜数，理论上说，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他自身的语法”。而规范语法指人们有意识遵循的、使言说无误的语言规则。二者的关系是：一方面，自发语法虽名为自发，但不真的是个体的创造，相反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宗教、阶级、种族等因素的影响，不断受到某些规范语法的影响。就像在乡村，人们试着模仿城里人的言谈；底层阶级尝试像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那样说话。上层阶级的规范语法对民众如何组织语言和思想施加了很大影响并留下了无数痕迹，但人们通常日用而不自知。另一方面，规范语法并非像一些语言学家所说的那样，源于自然或逻辑的法则，相反，

^①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s and Trans by Q. Hoare & G.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p. 451.